

集群治理何以推动小农经济现代化

——基于湘西H村冰糖橙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

李泽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小农经济现代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 但其固有的结构性困境长期制约着转型进程。本文以湘西H村冰糖橙产业集群为例, 融合集群治理理论, 构建“组织嵌入—技术赋能—利益联结—风险缓冲”的分析框架, 系统探讨产业集群推动小农经济现代化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 产业集群通过构建协同治理机制, 依托组织化载体整合分散农户的生产能力, 有效衔接小农户与大市场, 推动小农经济向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和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具体而言, 组织嵌入为多元主体协同提供制度保障, 技术赋能为技术扩散提供组织化路径, 利益联结促成激励相容的分配机制, 风险缓冲确保治理体系的系统韧性。四个维度相互关联、层层递进, 有效破解了小农经济的结构性困境, 推动小农经济现代化发展。

关键词: 产业集群; 集群治理; 小农经济现代化; 小农户; 乡村全面振兴

中图分类号: F326.13; D66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6)03-0040-09

How does cluster governance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smallholder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the rock sugar orange industrial cluster in H Village, western Hunan

LI Ze

(School of Soci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mallholder economy is the key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but its inherent structural constraints have long restricted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Using the rock sugar orange industry cluster in Village H, western Hunan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integrates cluster governance theory,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organizational embedding-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interest linkage-risk buffering” has been constructed, and the practical logic through which industrial clusters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mallholder economy has been systematically explored. The study shows that by establishing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consolidating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scattered smallholders through organized platforms, industrial clusters effectively bridge smallholder farmers with large markets, and promote scalable, intensive, branded, and high-value-added development of smallholder economy. Specifically, organizational embedding provides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collabor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offers an organized path for technology diffusion, interest linkage fosters an incentive-compatibl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and risk buffering ensures the systematic resilience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These four dimensions are interrelated and progressive, effectively breaking th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of smallholder economy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mallholder economy.

Keywords: industrial cluster; cluster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of smallholder economy; smallholder farmers;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收稿日期: 2025-10-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4BMZ02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1CSH043)

作者简介: 李泽(1995—), 男, 山西长治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产业振兴。

一、问题的提出

小农经济现代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石, 直接关系到乡村全面振兴的发展成效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进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

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乡村全面振兴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和艰巨任务，其成效在于农民能否做主并受益^[1]。当前，“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小农户仍然是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影响小农经济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既包括源自顶层设计、依循系统化推行路径的政策干预，也包括根植于乡土社会、具有内生演进特征的经营决策。二者共同塑造着小农经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策略选择与发展路径。

长期以来，学界围绕小农经济的现代化路径展开了深入讨论。一是关于“激进替代”与“渐进适应”的发展路径之争。早期研究中，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主张以资本主导的规模化农业替代小农经济，认为小农经济是农业现代化的阻碍^[2]，将其等同于一种小规模、低效率、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形式，强调通过土地集中、资本介入重构农业经营主体^[3]。然而，这一观点忽视了中国农村人地关系和乡土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如华北某村庄案例所示，即便具备规模化条件，很多农户仍倾向于维持小农经营格局^[4]。这意味着，小农经济并非如激进主义所言那般“等待被替代”，而是呈现出了另一种现代化可能。与之相应，学界也形成了以贺雪峰、黄宗智等为代表的“渐进适应论”。贺雪峰等提出“保护型城乡二元关系”，认为小农经济并非现代化的对立面，而是城乡稳定的“弹性缓冲带”^[2]。黄宗智通过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提出“现代小农经济”概念，强调小农户、小农业、小农村是现代化的重要资源^[5]。上述争论的核心分歧在于：小农经济是现代化的阻碍还是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是应该被资本化规模农业替代，还是应在保护和适应中实现内生转型。这一分歧的实质，是两种路径对小农主体性的不同定位——前者视小农为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被消解的对象，后者则视其为可被激活的主体。二是从“生存理性”到“多元理性”的小农经济内涵重构。恰亚诺夫将小农经济定义为“生存导向”的自给自足经济^[6]，而在中国的实践中，小农经济内涵随制度变迁不断拓展。梁伟从农民理性视角提出，农村人口流动与制度变革会促使农民理性从“生存理性”转向“生存—市场—社会多元理性并存”，

催生出老人农业、中农农业、家庭农场等现代小农形态，呈现现代生产要素普及、经营规模化与兼业化并存的特征^[7]。杜鹏指出，小农生产因农作参差期、土地细碎化呈现强烈的社会性，小农通过村社互助、服务共享降低生产成本，为资本、技术与土地结合创造条件^[8]。上述研究从农民理性与生产社会性两个维度，揭示了小农经济内涵从单一生存逻辑向复合多元逻辑的演变，为理解小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应性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总体而言，小农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在于通过组织化、技术化、市场化与风险社会化等路径，克服其固有的分散化、滞后性、边缘化与脆弱性等结构性困境，进而实现小农生产向规模化、集约化、高附加值的系统转型。

尽管理论层面已形成基本共识，但在实践层面，政策、技术、资本等外部要素的持续注入为小农经济现代化提供动力的同时，也与小农自主发展之间长期存在实践张力^[9]。中国小农在现代化转型中展现出“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发展韧性^[10]，但其固有的结构性瓶颈，如规模分散、技术滞后、市场对接不畅等，使其难以形成规模经营、集约经营的现代生产体系^[11]。再加上农户个体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薄弱，传统生产模式与现代产业需求脱节，无法有效适应农业高质量发展。为突破上述瓶颈，小农不得不依赖政府的政策扶持、企业的资本介入以及外部组织的专业输入，依托自上而下的资源整合与产业干预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12]。然而，外部力量的标准化、规模化治理往往与小农的在地性、多样性存在结构性矛盾。行政主导或市场驱动的模式过度突出单一主体作用，导致小农经济现代化路径陷入刚性约束；政企协同虽被视为小农经济现代化的理想范式，但实际运作中难以建立政府、市场、组织与农户的动态平衡机制，对政策干预强度、资本渗透深度、社会组织专业服务与小农组织化程度的配比关系缺乏精准把握，容易陷入行政包办或市场放任的传统模式^[13]，对小农经济现代化转型的指导作用有限。

综上，已有研究诊断了小农经济的结构性困境，围绕“政府—市场”的宏观叙事或农户的微观行为，阐释了小农经济现代化路径多元协同的必要性，但仍存在一个关键不足，即对接二者的中观治理结

构缺乏系统剖析。换言之,已有研究对于协同何以制度化、外部资源如何通过特定的组织载体与治理规则转化为小农的内生发展能力等核心问题,仍缺乏有效的分析框架。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市场与小农之间,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中观治理载体,日益展现出整合多元主体、协调利益关系的独特功能。然而,集群治理如何系统性地作用于小农经济现代化,仍缺乏深入的理论剖析。笔者认为,将集群治理理论引入小农经济领域,可弥补上述理论视角的不足。基于此,本文拟着力破解三个核心问题:作为中观治理载体的产业集群,其内在治理机制如何系统破解小农经济结构性困境?这一治理机制在实践层面遵循怎样的运作逻辑?由此可提炼出哪些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命题与政策启示?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 理论基础:从集群治理到小农经济现代化

集群治理是在一定产业集聚条件下,通过制度安排与组织协调,协调多元主体利益、规范成员行为、促成集体行动的制度化过程。其核心目标在于创造良好秩序、缓解集群内部矛盾,最终实现共同利益^[14]。20世纪末,Brusco^[15]较早将治理引入产业集群分析范畴,Gilsing^[16]随后进一步实现了理论突破,推动产业集群研究从静态描述转向动态分析。这一转向使研究逐渐聚焦于特定产业集聚条件下的地方治理活动^[17]。产业集群通过激发主体积极性、防范机会主义与协调成员关系,提升集群系统的稳定性与创新活力^[18],使多元主体的集体行动转化为推动集群持续发展的制度化力量。集群结构特征与演进规律对治理机制的设计、选择与执行效果具有关键影响,有助于推动集群有序发展^[19]。乡村振兴背景下,集群治理被视为优化农业资源配置、增强产业竞争力、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效组织方式^[20]。

在厘清产业集群治理基本内涵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回答一个关键问题:诞生于工业化与市场化背景下的产业集群治理理论,能否有效解释以小农为主体的乡村产业转型?本文认为,这一理论迁移的有效性,取决于产业集群能否在小农生产占主导、社会结构复杂、产业链条较短的乡村场域中,构建起适配的治理结构。产业集群必须直面上述特征,通过有效的治理安排,将外部资源导入与小农

主体性激活有机结合起来,方能推动产业效率提升,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基于上述认识,产业集群治理推动小农经济现代化的作用可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产业集群有助于小农克服规模不经济与要素配置低效等发展瓶颈^[21]。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通过规模效应、知识溢出和协同创新,推动小农经济现代化^[22]。然而,若缺乏有效治理协调,集群可能引发结构性排斥,导致“去小农化”“市场封闭化”等问题^[23]。二是产业集群为小农经济现代化构建了综合性赋能框架。在统筹产业效能提升与乡村社会发展的双重目标中,实现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社会组织与农户自主实践的有机融合,以产业振兴驱动乡村全面振兴^[24]。学界从不同角度讨论了小农经济现代化与产业集群的关系。雷贵提出的集群式治理强调乡村产业集群在资源整合与治理重构中的作用,但侧重于宏观治理结构的描述,未能揭示集群式治理作用于小农户的微观机制^[25];余晓洋等关注小农户嵌入现代农业的路径,虽强调组织化与政策引导,却未深入剖析产业集群作为治理载体的系统性与动态性^[21];薛永基等聚焦农村创业扩散对产业集群的驱动,但未涉及小农主体性构建与风险治理问题^[20]。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多从单一维度切入,缺乏对集群治理多维联动机制的系统整合,对产业集群在实际运行中如何协调政府、市场、组织与小农之间的关系缺乏动态分析。

(二) 产业集群推动小农经济现代化: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小农经济作为中国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展现出强劲的内在韧性——如通过乡土社会规则适配现代生产要素、以多元劳动力配置平衡市场需求与生产成本^[26],又面临空间束缚、要素错配、组织化程度低以及粗放经营、人地关系异化^[27]等结构性困境。其现代化转型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成效与农业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产业集群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关键载体,在实践中已展现出显著的治理效能,如推动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优化联农带农机制、重塑乡村经济社会结构等。

基于上述理论对话,本文发现既有研究在产业集群与小农经济现代化的关联上存在“碎片化”与“空泛化”的局限。一方面,小农经济现代化研究

多聚焦农地流转、政策赋能等单一路径，很少将产业集群视为治理载体，而仅视为经济集聚现象；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强调产业集群对乡村经济的赋能，却未能系统剖析其内部治理机制如何精准破解小农经济的核心困境。为弥补上述研究不足，本文拟结合湘西M县H村冰糖橙产业集群发展的现实特征，尝试构建“组织嵌入—技术赋能—利益联结—风险缓冲”分析框架（图1）。

该框架的核心论点是：产业集群推动小农经济现代化，本质上是依托一套相互关联的治理机制，对小农经济面临的规模不经济、技术滞后、利益侵蚀和风险脆弱等结构性困境进行系统破解的过程。

框架的四个维度并非简单并列，而是构成一个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有机整体。其中，组织嵌入为小农参与现代产业体系提供制度载体，是基础机制；技术赋能通过知识溢出与能力建设提升小农生产效率，是驱动机制；利益联结通过优化分配结构保障小农发展收益，是保障机制；风险缓冲通过多元化风险分散手段增强小农抗风险能力，是稳定机制。四者协同作用，共同推动小农经济从传统分散模式向现代集约模式转型。简言之，组织嵌入是前提，技术赋能是手段，利益联结是保障，风险缓冲是底线，四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产业集群赋能小农经济现代化的整合性治理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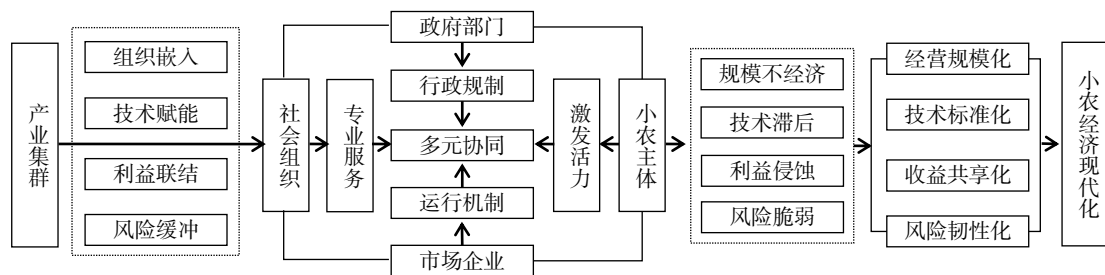


图1 产业集群推动小农经济现代化的协同治理框架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一）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以湘西M县H村冰糖橙产业集群为经验素材，呈现集群治理推动小农经济现代化转型的实践过程与运行逻辑。H村属于典型的产业特色型村庄，以“冰糖橙”为核心的产业形态具有完整的发展轨迹与丰富的治理实践。笔者于2024年7月赴H村开展了为期20天的田野调查，通过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化访谈和文本资料收集等多种方式获取一手资料（表1）。

表1 田野调查方式与资料情况

方式	资料来源	资料数量
参与式观察	体验疏果、剪枝、病虫害防治等内容，参加各类产业发展会议、项目执行和日常检查等工作	2万字观察笔记、1份产业清单
半结构化访谈	对村干部、普通农户、种植能手、合作社负责人以及返乡创业青年等关键信息人进行深度访谈	5万字访谈记录
文本资料收集	收集冰糖橙相关的政策文件、合作社章程、会议纪要、财务报表、村志以及媒体报道等文本资料	15份文件资料，1本村志

调研结束后，笔者持续与村“两委”成员保持微信沟通，动态跟踪产业进展，确保研究的时效性

与连续性。这些材料全面翔实，能够最大限度保证产业集群实践的真实呈现和对小农经济现代化的深层考察。

本文选取H村冰糖橙产业为案例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两方面考量：第一，H村的冰糖橙产业形成了清晰的代际升级路径。产业先后经历“生存型种植—规模型种植—品质型种植—价值型种植”四个发展阶段（图2），从家庭副业发展为地方支柱产业，为理解小农经济在外部政策、技术与市场冲击下如何适应、调整并实现转型提供了历时性观察视角。第二，H村兼具小农经济的共性困境与集群治理的成功实践，具备典型案例特征。M县作为全国重要的冰糖橙产区，2024年全县种植面积达28.5万亩，年产量52.8万吨，产值突破19.02亿元，已成为当地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和乡村振兴的主导力量。H村作为M县冰糖橙产业的关键产区，产业模式以小农户为基本单元，在保留家庭经营灵活性的同时，面临分散小农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的组织化瓶颈、动力缺失与治理困境等共性问题。该村通过构建多层次、嵌入式的集群治理体系，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推动产业从简单集聚向协同创新与

价值提升转型发展,为同类地区破解小农经济现代化难题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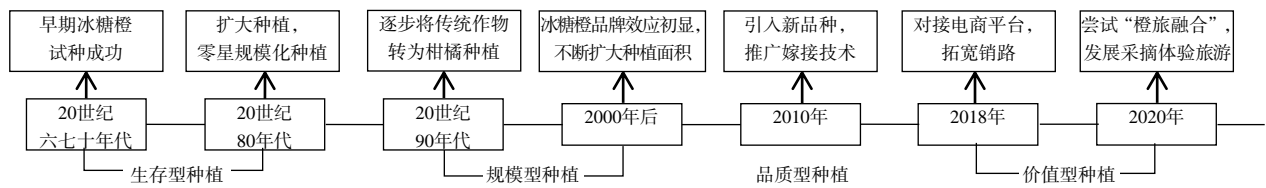


图2 H村冰糖橙产业发展历程

(二) 案例介绍

H村位于M县西北部,村域面积7.4平方公里,下辖7个村民小组,共有454户1540人。该村地势北高南低,南部为平地,属典型丘陵地貌。凭借独特的富硒紫色砂壤土及适宜的气候条件,该村产出的冰糖橙糖度高、口感清甜,使其成为全县优质冰糖橙种植大村。2000年,在县委政府的号召下,村里家家户户陆续建园种植冰糖橙,逐步形成以小农户为经营主体的产业基础,户均种植规模约1~3亩。2009年,村民家庭年收入近2万元,初步展现出产业化带来的经济成效。

然而,与许多传统农村一样,H村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小农分散经营、基础设施薄弱与村庄内生动力不足等结构性困境。一是小农分散经营与整合之难。H村农户长期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小规模、同质化生产。村里耕地破碎,且多为丘陵坡地,难以开展机械化作业。村“两委”曾尝试引导村民集中流转土地,发展柑橘、冰糖橙等特色种植,但由于村民对土地依赖性强、流转意愿分化,加之缺乏龙头企业和合作社有效带动,土地整合屡屡受挫。分散经营不仅提高了生产成本,也导致冰糖橙品质参差不齐,难以形成品牌效应。二是基础设施滞后与发展之困。基础设施薄弱是H村长期以来难以突破的硬约束。村内主干道虽已硬化,但通往橘园和田间地头的机耕道多为土路,雨天泥泞难行,农资运不进、产品运不出。水利设施年久失修,部分灌溉沟渠淤塞严重,干旱季节村民只能肩挑手提给果树浇水。此外,冷链物流、仓储加工等配套设施短缺,造成农产品保鲜期短、损耗率高,使对接外部市场困难。三是村庄内生动力不足。H村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与村庄空心化问题。留在村里的人多为老年人、妇女和儿童,青壮年劳动力以外出务工为主。留守老人和妇女接受新技术的能力有限,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与体力不足。部分农户抱有

“等靠要”思想,在产业发展上寄希望于上级拨款或企业包办,自身主动谋划、投工投劳意愿不足。内生动力缺失,使外部帮扶难以转化为村庄持续发展的能力。

2010年以来,M县持续加强产业政策支持^①,明确了冰糖橙产业的发展路径与激励措施。在政策推动下,H村扩大种植规模、优化品种结构,积极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渠道,打造乡村果农电商与微商开放平台,形成“种植基地+实体+微商+社区、乡镇配送”的产销一体化模式,有效拓展了冰糖橙、黄桃等生态产品的多元化销路,将当地自然资源切实转化为经济优势。H村在产业发展、生态建设与乡村治理方面表现突出,先后获评省级美丽乡村、乡村振兴建设示范村与特色精品乡村。

四、产业集群推动小农经济现代化的实践逻辑

产业集群推动小农经济现代化转型,本质上是依托协同治理机制对小农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困境进行系统破解的过程。H村的实践表明,产业集群并非简单的空间集聚,而是通过“组织嵌入—技术赋能—利益联结—风险缓冲”的机制联动,构建了一个能够有效吸纳、改造并提升小农生产方式的治理体系,从而实现小农经济的现代化转型。

(一) 组织嵌入:多元主体协同的制度基础

1. 从分散经营到规模协作

在H村,分散小农户长期面临土地细碎化、生产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等难题。为破解这一困境,村“两委”牵头成立冰糖橙种植专业合作社,推动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建立规模化种植基地。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起初部分农户不愿流转,对合作社经营能力缺乏信任。对此,合作社采取示范引领、弹性协商、规范契约等方式,先由党员和种植大户带头流转土地,逐步带动全村参与。随着产量不断

增加,龙头企业与合作社逐步建立稳定合作关系,推动品牌建设与市场渠道拓展。企业利用“M县冰糖橙”地理标志认证,开展线上营销推广,建立“小农户+合作社+企业”的协作网络,既缓解了农业经营中的规模不经济问题,也通过稳定利益联结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组织通常基于特定决策情境形成行动准则和选择偏好^[28]。以H村小型农业水利设施建设为例,项目采用“受益主体自建、自管、自用”模式,由村委会通过“一事一议”组织施工,广泛动员受益群众投工投劳参与共建。村党支部书记表示:“高标准渠道既能灌溉又能运输,深受村民欢迎,村里人都非常支持渠道建设,每天都有村民投工投劳参与其中。”(MWH-20240710)^②项目按时完成,恢复了小水源蓄水能力,畅通灌溉“中梗阻”,为柑橘等经济作物生产提供了坚实基础。

2. 组织嵌入优化治理效能

组织嵌入将分散的小农户纳入能够实现规模协作的制度化框架中。第一,多元主体协同。农户参与为产业集群提供了基础生产单元与持续发展动力;合作社以规模化经营和产业链延伸实现盈利空间拓展;企业依托原料稳定供给与品牌共建降低交易成本;科研机构完成成果转化;政府通过推动产业振兴获得政策绩效与治理正当性。多方协同催生了产业治理利益共同体的形成与延续。第二,组织化载体有效运转。实践中,政府扶持合作社打造标准化生产基地,促使农户在农资采购、生产规范与品牌销售上实现统一;企业通过订单农业、“保底+分红”等方式与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契约关系;科研机构借助合作社开展技术示范与服务推广。合作社内部遴选出的示范户率先接受技术员的指导,通过田间示范、邻里帮带等方式将技术规范传递给普通农户,形成层层传导的“专家—技术员—示范户—普通农户”链条。第三,增强应对外部变化的能力。多元主体以四方议事会为平台^③定期就市场波动、政策调整等外部冲击进行协商。例如,当生产成本大幅上涨时,四方共同议定最低收购价与补贴方案,即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引导、企业承诺优先采购、合作社组织履约、农户代表反馈承受能力,由此形成动态调整的集群战略。这种协商过程催生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范的混合执行机制,有效维护了合作秩序的稳定。

(二) 技术赋能: 技术扩散的组织化路径

1. 从传统种植到现代生产

H村冰糖橙产业的技术升级,体现为持续的品种改良和数字化工具引入。在品种改良方面,冰糖橙从早期的锦红、锦蜜,逐步更新为近年重点推广的怀桔1号、阳光1号,品种结构持续优化,产品产量和品质不断提升。在技术落地方面,H村定期邀请省农科院研究人员及本地“土专家”进村培训和现场示范,打通了技术供需之间的堵点。一位村民回忆道:“看见别人家嫁接的冰糖橙又红又大,我就按专家讲的法子剪了些接穗试了试,没想到一年就挂果了,签了长期合同根本不愁卖。”(TSG-20240713)在数字化工具应用方面,H村借助微商平台和社区团购实现了产销直连,减少了中间环节的损耗。农户根据平台销售数据分析消费者偏好,主动调整品种结构与营销策略。H村还组建了电商服务站,为农户提供产品拍摄、包装设计、物流对接等一站式服务,逐步扭转了过去“种出来不知道卖给谁”的窘境。外来技术逐渐内化为小农户能理解、可操作、会受益的生产要素,为乡村产业集群的效能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

2. 技术赋能重构产业秩序

数字技术实现问题识别精准化、公共服务供给精细化和乡村治理科学化^[29],成为产业集群升级的关键驱动力。第一,搭建数字平台,降低技术推广与服务成本。政府搭建起“镇—村—社”三级数字农技服务网络;科研机构依托数据参与技术攻关,推动品种选育与种植模式优化;合作社则借助数字化管理系统,对社员生产进行统一指导与品质管控,从而提升集群整体资源利用效率。以“数字橘园”系统为例,部分农户借此实现对土壤湿度、光照强度、病虫害等情况的实时监测与精准干预,显著提升了冰糖橙的品质与效益。第二,推动生产模式向智能化、绿色化迈进。小农户在数字系统支撑下逐步摆脱“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转向精准施肥、节水灌溉与绿色防控。生产环节积累的实时数据,进一步打通了加工、销售环节的信息壁垒,催生了以小农户为基础、平台为枢纽、品牌为引领的产销一体化模式。该模式不仅降低了流通损耗,还通过数据驱动实现按需生产,有效拓展了农产品的市场空间,提升了溢价能力。

(三) 利益联结：激励相容的分配机制

1. 从被动生产到合作共赢

为平衡农户基本生计保障与持续增收动力，H村探索出“保底收购+溢价分成”的利益联结模式。合作社章程明确规定保底收购价，同时引入溢价分成机制，多方协商确定市场波动中的分成比例。共同利益促使多元主体跨越信任鸿沟，围绕自身利益、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开展磋商、博弈或联合^[30]。2023年优质冰糖橙的收购价约为4.4元/公斤，而终端零售价可达9元/公斤以上。在当月召开的四方议事会上，农户代表提出，农资和人工都在涨价，保底价不动的话，他们实际收入没增加。企业方回应，品牌推广和电商运营的成本也不低。合作社建议暂缓调整保底价。经过两轮协商，最终确定溢价分成比例在35%至45%之间浮动，具体视当年行情动态调整。此外，地方政府设立产业风险基金，在市场价格低于成本时启动差价补贴。四方议事会成为常态化利益反馈平台，通过财务公示、协商调价等机制保障分配透明度，防止精英群体过度获益而挤压小农户利益，为长期合作奠定信任基础。

2. 利益联结激活主体参与

H村冰糖橙产业以制度创新优化收益分配，保障小农获得合理回报，激发主体活力，推动集群协同发展。第一，稳定基本收益。对内，合作社以订单农业、保底收购、二次返利等契约形式，为农户提供稳定预期收益，有效应对市场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外，合作社统一谈判，推动优质优价，使农户收购价提高约20%，有效抑制了采购商的压级压价行为，农户收入增长进一步调动了种植积极性。第二，拓宽增收渠道。H村鼓励农户以土地、劳力、资金等要素入股合作社或企业，推动其从单纯的生产者转变为产业链的受益者。明确小农在资源入股、分工协作、品牌收益中的参与份额，实现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的有机统一。第三，弥补分配结构性失衡。地方政府通过设立产业风险基金、建立价格调节机制、发放专项补贴等手段对冲市场波动，在区域品牌使用、电商激励等环节向小农与合作社倾斜，防止利益过度集中。在这一机制推动下，小农逐步成长为有组织依托、有生产能力、有话语权的集群主体，组织化程度与议价能力持续提升，责任意识与归属感不断增强。

(四) 风险缓冲：风险共担的系统韧性

1. 从脆弱应对到系统防护

针对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市场波动、同质化竞争及产能过剩等多重因素^[31]，H村在产业风险治理方面探索出一套横向协同与纵向统筹相结合的立体机制。在横向协同方面，合作社联合保险公司推出“冰糖橙气象指数保险”，一旦累计降雨量突破预设阈值即可自动触发理赔，较好地解决了传统农业保险在定损环节操作困难的问题。在纵向统筹层面，地方政府整合农业农村局、气象局、市场监管局等多部门数据，搭建产业风险预警平台，实现早期风险识别和快速响应。当地还设立了风险准备金池，合作社按每公斤0.2元的标准从销售额中计提专项资金，地方政府以1:1比例配套注资，建立起覆盖全村30%种植面积的专项保障基金。2023年春旱期间，该资金池快速启动，用于补贴滴灌设备采购及农业生产用电，比传统救灾审批流程缩短20天。在风险治理中嵌入正向激励机制，农户若连续三年达到绿色规范种植，风险准备金缴纳标准降至0.1元/公斤，既减轻农户负担，也通过经济收益引导其生产行为向绿色可持续方向转型。

2. 风险治理提升系统韧性

产业集群在风险识别、损失分摊与补偿反馈等方面形成多方协同与制度衔接，逐步构建起兼顾弹性和稳定性的治理结构。第一，构建市场化风险分担机制。在契约合作中，保底收购为农户收入提供价格安全网，缓冲市场波动的直接冲击；溢价分成则在行情向好时让农户分享额外收益。由此，部分市场风险转移至抗风险能力更强的主体，有效缓解小农户直接面对市场风险的压力。第二，整合风险防控资源。政府承担气象预警、病虫害监测及应急物资储备等责任，合作社与龙头企业组织统一植保、标准化生产和绿色防控的实施，科研机构则依托品种改良与技术升级提升产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政府、市场主体与社会力量协同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风险防控体系。第三，政府托底与合作社互助互为补充。地方政府设立专项风险基金，在重大灾害或市场危机时，及时启动救助程序并推动产业恢复；合作社内部通过资金互助和产业信贷担保，帮助小农户应对短期流动性压力，使小农户从风险的被动承受者转变为协同应对的积极行动者。

五、结论与讨论

农业产业集群是小农经济现代化的重要组织形式，其发展水平直接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成效。本文基于集群治理理论，以湘西H村冰糖橙产业集群为分析对象，构建“组织嵌入—技术赋能—利益联结—风险缓冲”分析框架，系统揭示产业集群推动小农经济现代化的实践逻辑。研究表明：产业集群并非简单的产业集聚，而是一套能够系统回应小农经济结构性困境的协同治理体系。其中，组织嵌入将分散经营的小农户整合为规模化协作的生产单元，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的转变；技术赋能将现代生产要素导入小农生产体系，推动传统经验型农业向数字化、标准化升级；利益联结建立起激励相容的分配机制，使小农从产业链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价值共享者；风险缓冲则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构建覆盖自然、市场等多重风险的制度屏障，提升了小农经济的系统韧性。四个维度彼此支撑、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产业集群推动小农经济现代化的核心逻辑。

以上结论对于发展产业集群，促进小农经济现代化具有以下启示：

其一，应构建与小农经营相适应的集群治理结构。产业集群的制度设计要以尊重小农户的基本经营主体地位为前提，将保障小农生产自主性与经营韧性作为制度设计的核心原则，防止在规模化进程中产生对小农的“挤出效应”。具体实践中，应注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融合，依托合作社等载体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网络，确保小农户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具备实质性参与能力与话语权，从而在组织化进程中推动小农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型，而非简单取代。

其二，应构建以实际需求为导向的数字化赋能机制。数字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应以回应小农生产痛点、降低经营成本、提升市场对接效能为根本导向。充分发挥县、乡、村三级基层网络的作用，建设分层分级的技术推广与服务体系，通过降低技术认知门槛和使用成本，防止数字化沦为“技术悬浮”或形式主义。数字赋能的深层目标在于引导小农生产方式从传统的经验依赖向数据驱动的精细化管理转变，使数字红利真正惠及广大分散经营主体，而非局限于规模经营主体。

其三，应创新形成激励相容的收益共享机制。利益联结的关键在于通过制度设计确保小农在产业链中获得合理回报，从而激发其持续参与的内生动力。应积极推广保底收购、溢价分成、二次返利等多元化合作方式，推动小农户从产业链末端的初级产品生产者，逐步转变为产业链的共建者与共享者。这一转变的实质，是通过制度创新重构农业产业链的利益分配格局，使小农真正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参与主体与受益主体。

其四，应构建系统化、多层次风险缓冲体系。农业产业风险治理不应局限于应对自然灾害，而应建立覆盖市场波动、技术失灵、产业同质化等多重风险的综合防控体系。具体而言，可从三个层面协同推进：一是横向风险分担，依托龙头企业与合作社的契约安排，实现市场风险在产业链主体间的合理分摊；二是纵向风险预警，整合政府多部门数据资源，建设产业风险预警平台，提升风险识别与快速响应能力；三是工具与机制创新，探索气象指数保险、收入保险等金融工具，将风险防控与绿色发展导向相结合，通过正向激励引导农户生产行为向绿色可持续转型，推动风险治理与产业升级形成良性互促格局。

注释：

- ① M县先后出台《M县以冰糖橙为主的柑橘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办法》《M县推进以冰糖橙为主的柑橘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等文件，持续加大冰糖橙产业发展支持力度。
- ② 访谈资料编码以“访谈对象首字母缩写和访谈时间”组成，如MWH表示访谈对象首字母缩写，20240710表示2024年7月10日。
- ③ 四方议事会是指由农户代表、合作社理事、企业采购经理、村干部参与的协商机制。

参考文献：

- [1] 王春光. 关于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体性问题的思考[J]. 社会发展研究, 2018, 5(1): 31-40.
- [2] 贺雪峰, 印子. “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兼评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5, 6(2): 45-65.
- [3] 陈航英. 新型农业主体的兴起与“小农经济”处境的再思考——以皖南河镇为例[J]. 开放时代, 2015(5): 70-87.
- [4] 熊春文, 柯雪龙. 小农农业何以存续?——基于华北一个村庄的个案研究[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 版), 2021, 38(6): 5-16.
- [5] 黄宗智. 资本主义农业还是现代小农经济? ——中国克服“三农”问题的发展道路[J]. 开放时代, 2021(3): 32-46.
- [6] A. 恰亚诺夫. 农民经济组织[M]. 萧正洪,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 [7] 梁伟. 农民理性扩张与小农经济再认识[J]. 现代经济探讨, 2023(1): 114-122.
- [8] 杜鹏. 社会性小农: 小农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基于江汉平原农业发展的启示[J]. 农业经济问题, 2017, 38(1): 57-65.
- [9] 张帆.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农技传递”路径及其评价——基于吉林省T县的田野调查[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5(1): 66-75.
- [10] 陈军亚. 韧性小农: 历史延续与现代转换——中国小农户的生命力及自主责任机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12): 82-99, 201.
- [11] 简新华. 中国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创新研究——兼评中国土地私有化[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3, 4(1): 46-74.
- [12] 陈龙. 小农视角下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J]. 经济问题, 2024(4): 92-98.
- [13] 付钊. 内生性治理驱动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逻辑与韧性机制——基于S村“镇村社联动”治理实践的分析[J]. 现代经济探讨, 2025(2): 110-121.
- [14] Langen P. Governance in seaport clusters[J]. Maritime economics & logistics, 2004, 6(2): 141-156.
- [15] Brusco S. The idea of the industrial district: its genesis[C]/Pyke F, Becattini G, Sengenbeger W. 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Inter-firm Co-operation in Italy. Genev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1990: 10-19.
- [16] Victor Gilsing. Cluster governance: How clusters can adapt and renew over time[C]/Paper Prepared for Druid Phd-conference, Copenhagen, 2000: 121-133.
- [17] 王立军. 全球与地方交互治理下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研究[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08(4): 107-112.
- [18] 兰岳云, 陈觉, 胡超. 乡村旅游产业集群治理模式及演化研究——以浙江省长兴县水口乡为例[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24(8): 75-84.
- [19] 易明, 杨树旺. 产业集群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机制体系[J]. 湖北社会科学, 2011(7): 95-98.
- [20] 薛永基, 杨晨钰婧, 张圆圆. 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 农村创业扩散何以驱动农业产业集群发展[J]. 中国农村经济, 2025(3): 41-60.
- [21] 余晓洋, 郭庆海. 小农户嵌入现代农业: 必要性、困境和路径选择[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19(4): 10-17.
- [22] 陈露, 刘修岩. 产业空间共聚、知识溢出与创新绩效——兼议区域产业多样化集群建设路径[J]. 经济研究, 2024, 59(4): 78-95.
- [23] 张琦, 鲁煜晨, 万君. 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研究[J]. 学习与探索, 2025(8): 114-126.
- [24] 黄思. 乡村特色产业新内生发展与动力融合的实践逻辑[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6(2): 69-78.
- [25] 雷贵. 集群式治理: 乡村产业集群再发展的实践逻辑[J]. 中国农村观察, 2024(6): 59-78.
- [26] 高士健. 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小农经济韧性研究——基于胶东葡萄种植户劳动力配置过程的考察[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1): 27-39.
- [27] 付磊, 赵利梅. 中国小农经济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4(6): 87-95.
- [28] Herrmann P, Nadkarni S. Managing strategic change: The duality of CEO personality[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4, 35(9): 1318-1342.
- [29] 杨秀勇, 徐成铭. 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有效治理的实践逻辑[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5): 141-153.
- [30] 刘桓宁.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互动何以影响基层治理效能——基于南方某乡镇乡风文明创建的案例比较[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5(5): 120-131.
- [31] 张梅, 邢蕾, 颜华. 农业产业链下农民合作社风险机制研究——基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2, 21(1): 1-9.

责任编辑: 李东辉